

# 冲突世界的兼容文明

——后“9·11”的文明诠释

蔡志强

**摘要:**“9·11”后,文明冲突理论再次引发人们的激烈争论。特别是当前的地区冲突热点被认为是基于文明的冲突时,人们发现,问题的解决因此变得更加艰难。本文认为,文明具有的多元性质和兼容特点决定了当代国际关系中“文明的冲突”是可以控制的。民族国家是文明兼容的重要载体和实施者,国家权力和利益的存在是导致冲突的根源。人类共同的改造自然与发展社会的经历、需求与愿望,决定了不同文明之间必然存在共性。这些共同的性质、特点以及不同方式所表现的共同内容,构成文明自身兼容的基础,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进一步扩大了文明的兼容性。文明兼容作为国际合作的理论平台,可以较好避免冲突,在寻求双边或者多边共有的利益支撑的基础上,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

**关键词:**多元文明;国际冲突;全球主义;兼容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1569(2004) 03- 0036- 08

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理论的阐述,理论界一直莫衷一是。后“9·11”时代,当文明冲突理论成为现实世界必然的双刃剑时,连亨廷顿本人也曾一度对这一理论支吾其辞。我们在分析这一解释国际关系的范式时,需要进一步解读以下基本问题:文明的特性是什么?国际关系发展的动力与方向何在?文明本身是否兼容?在此,笔者从对亨廷顿与汤因比的文明观的分析入手,试对“9·11”后可能存在的兼容文明进行阐释。

## 一、文明的定义与文明分野

### 1. 不同语境下的文明界定

所谓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主客观世界,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践活动中所获得的对人类生存和社会演进所具有的物质、精神、制度以及生态成果的总和。从静态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取得的全部有价值的成果;从动态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具体过程,文明是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构成的有机整体。文明作为文化的现实载体,能够反映人类社会的实际发展水平,但是文明与文化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较大差别。本文基于分析的需要,仍然采用文明的文化表征和文化的文明内涵,对各国家主体的行为选择进行分析。

汤因比将文明界定为“历史研究的最小单位。”<sup>①</sup>是“社会的一个品种。”<sup>②</sup>而在亨廷顿看来,文明实际上是放大的文化,是文化实体,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他认为文明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sup>③</sup>。其文明观的主导因素是宗教与语言。他界定的文明是历史的积淀,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没有大小强弱之分,并且在现实中存

作者简介:蔡志强,复旦大学社科部2002级博士研究生。

在易于发生冲突的文明断层线。汤、亨二人根据各自的理解,将文明细分为18种乃至26种。尽管汤因比把他界定的文明划分为充分发展的文明(其中包括独立的文明和卫星文明)和失落的文明,但是他并没有对文明做优劣区分。在他看来,宗教进步意味着精神进步,而精神意味着人格。“当我们西方人把别人唤作‘土著’的时候,我们就等于在我们的观念里把他们的文化特色暗中抹杀了”。<sup>④</sup>而亨廷顿区分出的冷战后的7种或者8种文明实际上阐发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者不再是一般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的核心国家。显然,关于文明的政治解读,实质上是对未来社会秩序的一种建构。

## 2. 文明冲突理论解析

从我们对于文明的研究来看,文明或者文化同时具有软实力、软权力和强控制力的性质。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尽管亨廷顿也对文明的包容性做了充分的阐述,但是大多数学者还是相信亨廷顿是坚持文明冲突论的。在亨廷顿看来,现代性驱役下的全球政治正沿着文明界线进行重组,文化的异同引致其人民和国家的分离与聚合。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争线。考察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范式,有以下逻辑:(1)文明是冷战后国家区分的尺度和世界秩序的基础。(2)西方文明的走向衰落和非西方文明对其所属文化价值的肯定改变着既有的文明均势。(3)全球政治的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4)文明的未来是建立多文明基础之上的国际新秩序。亨廷顿指出,文明的历史特点和现实选择决定了断层线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之间的战争。阻止断层线战争发展为全球战争,主要依靠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家的努力。在亨廷顿所著的《第三波——20世纪晚期的民主化》中,他界定的世界民主化的发展趋势实际上是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是西方标准政治变革过程。与之不符的政治制度均被斥为“权威主义”政体或者“半民主”政体加以否定。这样一种西方模式强加于各民族国家,其结果必然是文明的“冲突”。

应该说,文明冲突理论作为解释国际关系的范式,肯定了文明在国际关系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有相当的现实性。并且确实提供了解决国际关系的思路。也有利于各国重新审视本国的文化战略和文明建构。这对人类文明进步有相当意义。布热津斯基曾经认为,中国清朝是通过高度的文化优越感加强统治的。亨廷顿也指出:“西方的中心问题是,除了任何外部挑战之外,它能否制止和扭转内部的衰败进程”,“在西方,比经济和人口远为重要的问题是道德衰落、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sup>⑤</sup>汤因比在分析文明垮台的性质时,强调了创造力的衰败和文化吸引力的枯竭将导致作为整体的统一性的丧失(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称之为全社会的社会团结的瓦解)。就人类文明的演进而言。这些观点揭示了加强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以文明冲突来解析国际关系,往往提供冲突激化的合法性依据,不利于国际社会的合作与发展,文明的未来需要有明确的分野。

我们在考察文明冲突的所谓文明断层线时,会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即地缘断层带与亨廷顿文明断层带的有趣契合,如:世界政治的热点波斯尼亚、外高加索、中亚、克什米尔、中东、斯里兰卡、苏丹、阿富汗等地区的战争,这些地区同时就是不同地缘的分水岭。如果我们再把眼光投射到历史上,那一系列山口和陆路通道,几乎就是不同文明融合与冲突的界碑。当然,如果从人类迁移与发展的轨迹来看,择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性以及山岭对人群、部族的阻隔,或者不同文明在千里沃野的交融、扭结,无疑在客观上造就了今天不同文明的历史分野。这至少在地缘上确证了文明不必然具有冲突的未来。人类在改造自然,满足生存需要的同时,创造了用以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手段,形成文明模式。并以此实现需要与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互动,进而推进社会发展。诚如恩格斯所言:“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sup>⑥</sup>从这一意义上,文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同时也是利益驱动的结果。文明冲突实际上就是利益诉求的结果。所谓文明的断层线往往就是地理断

层线造就的历史冲突的记忆。而当技术的进步成为文明发育的核心动力时,这种基于地缘的冲突是可以弥合的。

## 二、国际关系意义上的文明特性

基于对文明所作的分析,笔者以为,对文明范式的解读,至少应该明确当代国际关系中文明所具有的以下特性。

1. 文明的多元性和一维性。所谓多元性,指的是不同国家或者不同族群具有不同的文明形态。所谓一维性,指的是文明自身存在不断发展或者由于停滞而最终被其他文明替代的趋势。存在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

2. 文明的迁延性和包容性。文明的迁延性指的是文明可以跨越不同的地域和族群,为不同社会形态的人们所认可和接纳。文明的包容性,指的是由于文明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成果,文明具有兼容非己有内容与方式的特性。文明的这一特性为一些国家实行制度移植和实现文化认同提供了心理支点。亨廷顿认为的文明接受者之所以“接纳”这些进口,或者因为他们是舶来品,或者因为他们是被强加的。这实际上是排除了文明兼容的可能性。

3. 文明的内聚性和扩张性。由于文明是特定国家或者族群在改造世界,处理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过程中获得的,它对所属群体必然具有极强的归属感和感召力。文明的内聚特点,导致民族国家可以直接以文明的旗帜动员最大多数人们来实现国家的政治诉求。而所谓的文明的扩张性,一是由于文明自身的内在张力,二是由于文明认同群体对于自身文明的强烈的自豪感,导致人们主观上希望向其他群体进行文明推介以寻求对己方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制度设置的认同与仿效。文明的这一特性在历史上曾经被统治者作为对内凝聚和对外进行武力、贸易扩张的工具广泛使用。并且至今仍然以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面目流行。

4. 文明的坚韧性和脆弱性。所谓文明的坚韧性,指的是一种文明一经形成,往往伴随国家和族群的发展而发展,伴随族群的迁移而迁移,不为艰难的环境和苦难所窒息。马克思在阐发亚细亚生产方式时即已指出,印度文明在短期内多次遭受其他文明的入侵,但是终究没有被消灭掉,并且迁延至今。5000年中华文明在经历近200年的浩劫之后再次开始了民族复兴,同样说明了文明的坚韧性。但是同时我们会发现,与之相应的是文明的脆弱性,马克思说过,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许多已经湮灭在历史尘烟中的文明遗迹,无不闪烁着文明的慷慨悲歌,隐喻着文明创新的艰难与应然。

5. 文明普世意义上的平等性和潜藏着的民族狭隘性。所谓文明的平等性,首先在于人们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其次在于多元文明的平等性,文明是不同族群在特定环境下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成果结晶。这种改造自然的成果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汤因比曾经说过“无论人的物质生活可能被提到多高,也无法治愈他在精神上对社会公平的需要。”<sup>④</sup>他还鲜明地指出,西方人及其德行并不比现已泯灭的阿兹特克人、印加人、苏美尔人、赫梯人的文明更完美。但是,基于对自身文明的认同和自豪感,以及对其他文明的认识缺陷,不同民族国家在文明认识上又往往存在客观上的狭隘性。比如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里就毫不掩饰他对西方文明的高度褒扬,他指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是人类政治制度演化的终点,是全人类的终极目标。这种客观上的狭隘性恐怕就是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心理渊源。

应该指出的是,多元文明的兼容性,所追求的是文明之间的融合与一定程度的同化,而非通过奴役来实现文明整合的。国内曾经有专家在分析文明冲突理论时指出,基于科学精神和基督教传播精神的整个西方文明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向外扩张的历史,并且至今还在扩张之中。而中国的文明或者说非西方文明在扩张性方面异于西方文明。<sup>⑤</sup>事实上,由于西方许多国际政治学者对非西方

文明的认识存在偏颇,他们界定的冲突理论,更多的是基于对西方文明式微的担心。这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揭示了对于文明兼容性的肯定和推介有助于克服误解和不必要的国际冲突。我们在考察文明兼容性的时候,必须考虑以下准则:(1)文明的发展必须与人类社会演进的总趋势相一致。(2)必须充分考虑不同社会形态的实际,不能把既定的文明范式强加于他国。(3)必须充分考虑到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不能脱离国情简单移植文明模式。(4)民主与法治或者说完善的制度规范是文明发展的基本标志。康德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就是由“没有法律的生活状态进入有法律的文明社会状态。”

### 三、“9·11”后基于美国利益诉求的国际关系的新变化

#### 1. 构建欧亚大国的均势力量成为“9·11”后西方国家考虑的重点

“9·11”后,已经成为世界地缘政治重心的欧亚大陆益愈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与之相应的是,经济高度发展的“地缘政治棋手”和“支轴国家”之外,美国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些不被重视的贫困、弱小国家。由于美国在冷战后所赖以建构其全球战略的理论体系和规模宏大的星球大战计划迅速被恐怖主义的飞机“镂空”,这无疑给美国的全球战略带来了极大麻烦。当美国加紧对所谓“无赖国家”施加压力,并试图改造“失败国家”时,美国发现,如果按照以往的思路,美国的假想敌和潜在威胁源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尽管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加重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强势。基于此,加强与欧亚大国的合作成为美国必然的战略选择。正如亨利·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认为在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六大强权”和另外许多中小型国家所构成的民族国家体系中,“美国将必须学习在势力均衡体系中运作。”

2002年9月20日,布什政府在向美国国会提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美国新时期的三大战略性任务:以各种手段防范和制止恐怖主义的威胁,巩固军事同盟并与大国维持良好的关系,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美国的价值观、促进美国的经济的发展。报告把“先发制人”作为其战略基础。报告指出,世界大国因共同面临恐怖主义暴力和混乱的危险而同心协力,“我们也因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而日益紧密团结。”“在打击全球恐怖主义的战争中,我们绝不能忘却,我们最终是为我们的民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战”。<sup>①</sup>为此,美国必须将它的价值观念传播到全世界以维护美国的安全。报告分析指出:“贫穷不会把穷人变成恐怖主义分子和杀人凶手,但是贫困、制度衰败会使弱小国家很容易被境内的恐怖主义网络和贩毒集团所利用”。<sup>②</sup>缘于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和对中国文明的不了解,报告认为,中国正在发展先进的军事力量足以威胁其亚太地区的邻国。字里行间无不显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思维方式。

#### 2. 对所谓危险国家实施武力打击依然是西方国家维持国际关系的基本策略

9·11事件后,美国在寻求与大国沟通的同时,始终把实现对地区热点的控制作为基本的外交思路。刊登在美国《外交》季刊2002年3—4月号署名为塞波斯蒂安·马拉比的一篇题为《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的文章主张用所谓新帝国主义来对付所谓的“失败国家”和解决当前的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作者指出,持续的内战、激增的人口、迅速蔓延的艾滋病是造就“失败国家”的主要原因。这些“失败国家”为国际恐怖主义提供极好的庇护所,从而威胁着国际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如果国际社会要想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设法改变这些国家的政府。塞波斯蒂安·马拉比认为,当前的国际形势迫使美国必须抓住当前国际反恐的机会,采取与当前国际形势相适应的对外政策,建立新的帝国主义,发挥对国际社会的领导作用。作者告诫美国及其盟友再也不要期望用现存的国际机构来解决当前国际社会复杂多变的问题,美国及其盟友要么象他们的前辈建立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建立新的国际机构来解决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要么磨磨蹭蹭地等到不久的将来其它国家崛起从而可能对美国领导的新国际机构构成挑战。

以上情况表明,基于本国的国家利益诉求和对非西方文明特别是穆斯林文明持有的偏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无疑依循文明冲突的思维方式。正如汤因比指出:“印度的穆斯林征服者也许可以运用所向无敌的物质力量,但他们却无法从他们礼仪的堕落中解救自己。”<sup>11</sup>亨廷顿则始终认为“不论政治或宗教观点如何,穆斯林一致认为在他们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sup>12</sup>2001年12月,亨廷顿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发表了题为《穆斯林战争的时代》的文章。文章指出:“当今全球政治就是穆斯林战争的时代。……这些穆斯林暴力行动的例子可以归结为一种主要的文明冲突,即伊斯兰与西方之间以及伊斯兰与余方之间的冲突。”<sup>13</sup>“9·11”事件标志着“穆斯林战争时代已经落户美国”。亨廷顿预言到2020年,随着世界形势发生变化,随着穆斯林青年人口的萎缩,穆斯林战争时代将退出历史舞台。亨廷顿认为,穆斯林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对西方财富、权力、文化的不满、怨恨、嫉妒和敌视,穆斯林世界在部落、宗教、民族、政治和文化上的分裂刺激了穆斯林之间的暴力行动,与穆斯林复兴相伴的穆斯林社会高出生率造就的一批穆斯林极端青年这四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现在的穆斯林战争。埃及学者在驳斥亨廷顿时指出,亨廷顿所列举的许多战争和不加区分地把世界上大多数恐怖活动归咎于穆斯林,乃是“由于憎恨穆斯林而强加给穆斯林的”。其目的旨在为美国的军事行动提供合法性基础。事实上,从“9·11”到伊拉克战争,人们愈来愈发现“反恐”标签背后,是美国霸权与国际秩序之间的深层矛盾。

#### 四、后“9·11”的兼容文明

##### 1. 承认多元文明和文明的兼容性是“9·11”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必然选择

我们在分析冲突理论建构的国际关系时,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支点:保持现有的文明均势,保障西方文明的全球控制力是西方社会的基本需要。依据汤因比的观点,政治和军事扩张以及技术的改进都不能作为文明发展的合理标准。军事扩张作为军国主义的发展结果,本身就是文明衰落的标志。“9·11”后的国际关系则进一步表明,执着于文明冲突理论是难以解决现实世界的冲突的,执着传统的地域文明的区分标准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某个族群人口的增加也不是文明冲突的根源。寻求文明的兼容或许是克服国际关系激烈冲突的有效途径。只是西方的政治家们知道,强调文明的兼容性,意味着西方文明普世作用的缺失,他们无法接受这个没有美国领导的多元文明世界。

如前所述,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发展社会的成果。是经济、政治、文化形态和包括自然在内的各种要素的有机结合、互相作用的统一体。人们在衡量社会进步的水平时,常常把所创造的一些具有共性的要素构成的文明成果作为一种标志。尽管基于不同环境下民族、国家利益与不同社会群体的要求,文明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质。但是人类共同的改造自然与发展社会的共同经历、共同需求与共同愿望,决定了现有的文明,无论以何种方式和标准加以划分,必然存在共性。这些共同的性质、特点以及不同方式所表现的共同内容,构成文明自身兼容的基础,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进一步扩大了文明的兼容性。应该看到,分化是生长的标志,一致是解体的标志。和而不同,共同发展是“9·11”后国际关系发展必须充分重视的基本要素。阐发文明的兼容性,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尊重并发展世界的多样性”。9·11事件及近来反复发生的自杀性爆炸事件表明,恐怖主义不再是针对某些特定人物或组织而展开,无辜百姓往往成为不同政治组织的牺牲品。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多变,但是人们寻求安宁与健康的国际关系秩序的愿望也更加迫切,这在实践中为各国以“和而不同”的方式解决国际纠纷,更多地寻求共同点,发展合作关系提供了可能,创造了条件。基于世界人民普遍的和平与发展的共同需要,各国政府为维护国家利益,保障本国居民和散布世界的本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各民族国家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通过加强交流,节制冲突,实现共同发展。

##### 2. 全球化在加剧国家冲突的同时,为文明兼容创造了条件

在美国看来,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要使这样一个世界保持和平与稳定,必须而且只能有一个领导。作为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全球化对美国不无裨益,它在现实层面增强了美国对世界的领导能力,有助于美国加强政治和文化上的优势。事实上,不同文明在交融过程中,一些国家往往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实施文化霸权和文化侵略,推行文化帝国主义。全力叫卖其文化产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并对前沿知识和信息实行垄断,遏制不发达国家的文明进步。这种状况不仅使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整合变得脆弱,甚至使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欧洲社会在保持其文化认同、价值标准、制度规范等方面同样面临巨大困难。全球化的概念对许多人来说也许意味着有关同质、均等的世界发展的新方案。但是在现实中,全球化却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益愈突出的民族冲突。不过在历史上,移民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却没有遭遇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尖锐对立和冲突。那些脆弱的“土著”文明在遭遇伴随移民而至的“先进”文明后,往往迅速分解、内敛,或为移民文明所替代,形成具有扩张性的强势文明,从而实现了对欧洲文明的创造性转换,并在制度文明方面形成了具有鲜明色彩的政治制度。这应该是美国文明输出思维的历史基点。对于弱势文明,冲突与兼容都可能改变其文明属性,关键在于要避免冲突,在兼容中保存本民族的文明。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确立了大国关于“国际惯例”的合法地位,发展中国家为融入国际社会而实行的“国际接轨”扩大了这些“国际惯例”的普适性。而在政治上,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一些超国家的国际机构在国际事务的作用日趋重要——尽管伊拉克战争再次凸现了国家强权的政治价值。许多学者指出,欧盟这种超国家形态的发展,全球市场的展拓,大量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社会作用的发挥,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类似伦敦、香港、纽约等全球性大都市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已经使国际关系的发展模式打破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和作用,政治的时空变化必然导致新的认同形式的出现。不同文明在一定领域的非暴力冲突,也会同时进行交流、融合,甚至实现彼此的认同、吸纳、整合和转介。特别是国际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的严峻挑战,易于在各国间形成一些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判断,这些都有助于国际合作的实现。网络时代知识信息的全球流动,一方面实现了信息的共创、共享,甚至在意识形态存在趋同的趋势。另一方面,使各族群或国家的文明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激烈碰撞,走向分化、整合。甚至出现文明的湮灭和复兴。一些学者据此推测,信息时代的世界绝对会走向一个统一的现代文明,并最终实现社会形态的一元发展。笔者以为,文明的多元兼容难以迅速形成一元的现代文明和社会形态,但是会加速各国在国际关系中形成共识,实现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者说,就是美国体制和美国文化的全球化。因此,当我们用文明冲突的范式解答当代国际关系问题时,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文化民族主义将普遍凸现,这种趋势一方面将表现出反对霸权主义的政府与民间选择,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构建多极化国际秩序和多样化文化体系中的民族与国家依托。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今天国际关系中的冲突,如果我们执着于认定所有的冲突都是文化心理上的冲突,国际关系中可供回旋的余地将大打折扣,而且解决冲突的途径将更多地要诉诸武力。因此,文明兼容作为国际合作的理论平台,可以较好避免冲突,在寻求双边或者多边共有的利益支撑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

### 3. 国家利益的存在决定了国际关系中各国对于文明冲突的着力遏制

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认为,国际政治中的一切斗争都是基于权力的斗争。他指出:“象在所有政治中一样,权力欲也是国家政治中的显要因素,因此,国际政治必然是权力政治”<sup>14</sup>,当今世界依然是一个以民族国家对权力和利益的追求为动力的世界。国家是文明在国际上冲突的载体,权力、利益是文明冲突的根源和动力。分析当前存在的冲突热点时,我们会发现,文明的异质性并不必然导致军事和政治冲突。倒是基于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力的争夺构成了国际冲突的根源。特别是

在多元文明的国家里,国家利益无疑处于优先地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现实主义受到了全球主义和理想主义思潮的强烈冲击,但仍是许多国家外交政策和活动的哲学基础之一。基于现实主义崇尚国家实力追求国家利益的特性。在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关系主体的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各主权国家在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时可能导致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因此要依靠均势体系来抑制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促进和平事业。在全球主义模式下,任何构建剧烈冲突的政治行为都将给他己带来伤害。全球化、信息化的趋势带来的是多极角逐、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国际氛围。它要求各民族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要着力遏制文明冲突,实现文明兼容。在西方文明依然是处在扩张之中的强势文明的今天,非西方文明在如何吸纳、转介西方文明及现代其他文明成果的同时,有效弘扬本民族优秀文明成果,以克服文明的冲突,保障国家的利益,这依然是实现文明兼容的重要问题。

#### 4. 寻求文明兼容的制度依托

(1) 制度是人类自我规范的文明成果。在当前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各异,国家体制不同的社会里,要寻求共同的制度依托的确是艰难的。但是,既然制度是人类为整合生存与发展的秩序而创造出来的,建立一个大家在既定环境里必须共同遵守的制度体系,无疑是解决国际纷争的重要保障。建立共同的制度法则,基础在于对各国价值观念和文化归属的认同,在于对各国基本利益的肯定与维护。制度移植在一些国家的实践,本身就是文明兼容的实证。当然,各国际关系主体基于各自文明的认同,对任何一项制度都能进行符合自我利益的解释,这在存在利益分歧和多元文明的国际社会是难以消除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在于寻求共同的利益与文明的支点,这或许是现代制度文明对国际关系的现实遗产。

(2) 寻求解决国际冲突的制度安排。我们知道,全球化在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势必带来外来文明与本土文明的冲突与激荡,导致一些国家内部出现敌对状态。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族群之间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利益冲突日益加剧,本土族群往往认为外来群体要为自己不断恶化的境况负责,而这种冲突易于被人为地赋予文明内涵。奥地利学者霍利认为,当前,社会所必需的团结一致、互依互存的价值观,正在被国内和国家间鼓励竞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原则所广泛取代。而全球化的本质,恰恰在于建构一个充分体现所有国家的价值观和利益的世界秩序。为此,各民族国家和国际机构有必要认真对待民族和人民的这份需要。使这种兼容的价值观和原则能够为人们所首肯,并最终在所有特定国家的各项制度中,以及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性组织的国际性制度中得以体现。以此制约一些强势国家把他们的意志和命令强加给弱小社会。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应当改变全球化的进程,这一进程迄今大体上和西方价值观对世界其余部分的渗透同时并行。所以,应一视同仁地把世界所有文化的价值观纳入对话过程,并有意识地通过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工作去建立必要的结构和体制。

(3) 建立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在国际关系领域,挡风玻璃总要比后视镜看得清楚。在现代化进程中,科技和教育上占有优势的西方文明长期压抑着非西方文明的发展。随着处于现代化边缘的非西方文明重返中心趋势的加强,强调文明兼容将是克服国际冲突必然的路径选择。特别是在科技高速发展,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多元文明的共生是一种必然趋势。努力建立多元文明基础上的符合各国家人民基本利益诉求的国际关系新秩序,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多元文明的世界可以更好地实现社会合作,克服利益分化引致的冲突,包括同一文明内部的派系林立导致同样文明背景下的族群或国家、地区冲突。对于文明兼容性的彰扬可以消弭过于强烈的宗教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不同教派的教义约束,甚至实现对传统文明的现代性阐释。进而克服狭隘的激进情绪,消解历史仇恨和不满情绪。我们建构多元文明兼容的国际关系新秩序,本身就是建立在承认文明差异性的基础上的。由于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环境迥异。这些各异的社会文明成就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丰富性。这些不同的自然和

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历史长短不一的文明,本身就包含着在不同时期内各国人民对人类社会进步所作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内蕴着文明兼容的基因。它们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承认并尊重文明的多元性、多样性,是发挥人类文明多元性的基础,也是建立国际关系新准则的前提。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在阐发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时,必须明确的是中国的大国地位在于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持续贡献上,而不表现在对他国的强力控制上。毋庸置疑,中华文明正处在近千年特别是近200年来的又一次扩张之中,但是她更多是纵向性的张力,即中国希望复兴文明,建构自己的先进文化,但是不会向外扩张这种文明,不会把我们的文明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准,也不会构成对西方文明的威胁。只有西方文明在试图树立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其他文明的优势时,才会认为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发展构成了对西方文明的威胁。

在当今世界,基于民族国家标准的文明划分以及对于文明多样性的承认与尊重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文明兼容理论的阐发有利于加快民族之间、国家内部、国家之间乃至区域认同。文明具有的多元性质和兼容特点决定了当代国际关系中“文明的冲突”是可以控制的。人类共同的改造自然与发展社会的共同经历、共同需求与共同愿望,决定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消弭冲突,实现和平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

注释:

- ①[英]汤因比著,沈辉等译:《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90页。
- ②[英]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29页。
- ③[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25页。
- ④[英]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46页。
- ⑤[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350、351页。
-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页。
- ⑦[英]汤因比著,沈辉等译:《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23页。
- ⑧黄洋、李霞:《文明的威胁源:东方?西方?》,《探索与争鸣》1999年第9期。
- ⑨唐国栋:《最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浅析》,《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0期,第20页。
- ⑩唐国栋:《最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浅析》,《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0期,第19、20页。
- ⑪[英]汤因比著,沈辉等译:《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65—66页。
- ⑫[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237页。
- ⑬王锁芳:《穆斯林是否当今世界战争的罪人?》,《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2期,第108页。
- ⑭[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参考文献

- [英]汤因比著,沈辉等译:《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版。
- [英]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3月版。
-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著,王炜等译:《文化模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5月版。
- [美]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5月版。
- [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2月版。
- 黄洋、李霞:《文明的威胁源:东方?西方?》,《探索与争鸣》1999年第9期。
- 唐国栋:《最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浅析》,《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0期。
- 林利民:《国际地缘战略与中国的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3期。
- 王锁芳:《穆斯林是否当今世界战争的罪人?》,《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2期。
-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 《全球化,别无选择?》,《环球时报》2000年7月14日。
- 王缉思:《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 王逸舟主编:《恐怖主义溯源》,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 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 俞正梁等著:《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